

第十五章 避不过的旱象

——山西祁县求雨习俗调查*

山西地处华北区西部,位于黄土高原东部,该省的水资源为142亿方,每平方公里产流量和亩耕地拥有水量均低于全国水平(见表)。地表水严重不足,人均地表水更少得可怜,不足全国平均(2700方)的五分之一,是一个水源贫乏的省份。境内的河川径流,主要来源于自然降水,大多是季节河,虽有几条较大的外流河,但因山区面积大,地形破碎,河道下切,耕地面积高,不利于灌溉。同时,山西为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区,地处中纬度,地势偏高,尽管距海不远,由于受山脉屏障,海洋季风影响由东南向西北递减,所以干燥少雨,年降雨量少,且分布不均,与农作物需求期常不一致,尤其是春秋农作物正需要雨水时,老天爷故意作对,极易形成旱情。在山西,干旱问题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而是一种较为恒久的、几乎每年每月无处不在的天象,普遍性的干旱是千百年来山西民众躲不开的自然灾害。

省市名称	全国	山西	陕西	内蒙	河北	河南	江苏
产流量 (万立方米/ 平方公里)	26.2	8.76	21.4	5.5	12.4	25.2	25.0

* 本章曾发表于(台湾)《民俗曲艺》第127期。

省市名称	全国	山西	陕西	内蒙	河北	河南	江苏
亩耕地 拥水量 (立米/亩)	1780	198.5	731	8.9	174	325	357.6

晋中地区的祁县也不例外,它位于山西省的中部,大部分面积在晋中盆地内,还有一些丘陵和山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属于干旱地区,“十年九旱”是该地长久流传的谚语。旱象恰似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祁县大地,历代县志关于久旱成灾的记录不绝如缕。《祁县县志》(光绪八年本)云:“光绪三年,久旱不雨,死人一半,民易子而食。”

《祁县县志》(民国三十年本)载:

民国九年,天大旱,全年歉收,大小米钱二千四百文。

民国十三年,旱情严重,夏秋无收。

民国十八年,夏秋遭旱灾,灾民约六万。

民国二十年,天大旱,夏无收……。

可见,该地区旱灾不仅复发频率高,而且范围广,历时长,危害大。旱象困扰着本地民众的生存,却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这种艰难的环境决定了民众生存的状况,也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从明清到民国,乃至现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水平有限,求雨成为人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同自然抗争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山西乡间一种重要的民俗传统。笔者自1997年3月至1998年4月多次到该县的北谷丰、贾令、南团柏、谷村等村镇进行了调查,本文记述的是最有代表性的求雨民俗事象。

一 北谷丰村十三善人赴麓台山求雨

祁县城关乡北谷丰村,在县城的西北角,距县城仅5公里。据参加过求雨活动的本村老人陈步阁(79岁)回忆,民国二十年

(1931),天气大旱,农历五月的一天,村中乡闻(专门为村公所当差的人)敲响了挂在老爷庙(关帝庙)钟楼上的大钟,村民听到钟声后云集而来,村长宣布准备组织大家求雨,开会商议求雨事宜。会上选出13名自愿参加求雨的“善人”,被选的善人必须是50岁以下、18岁以上身体健壮且无恶行、虔诚信奉求神可以致雨的男子。

祈雨这天,13位善人身穿白孝服,头戴白孝帽,赤巴脚,早晨5时在村公所集合,准备步行到祁县来远镇石佛窟村外的麓台山求雨。为首的两位善人,一个人光膀子“扛楣”(楣是用三寸厚的松木或柏木做成的二尺见方、约20斤重的木架子),胸挂两个小水瓶;另一个人“挂钩”,即用筷子粗的白银打制的银钩从背后扎进去再钩出来,以示虔诚,表示向神灵负荆请罪。后面紧跟着的三人分别敲着小锣,拍着小钹,肩扛月鼓进行演奏“当当卜冬钹”,嘴里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奏一遍,念一遍,节奏缓慢,声调悲切。另外的八位善人,有一人用独轮车推着一只绑缚四蹄的活绵羊,准备用于祭祀麓台山龙王爷;还有一人是在沿途照料挂钩的善人,专给挂钩人的刺伤处敷药以防溃烂。剩余六人每两人为一组,分抬着三只食盒,当地亦称“食箩”,为木制椭圆型盛具,内分三层,有木盖。盖顶钉有铁环,把木棒穿过铁环可抬着走,共高1.5公尺,里面摆放的供品是:

四碟子干果:瓜子、花生、冰糖、柿饼。

四碟子鲜果:桃、梨、杏、苹果各四个。

八大碗:馄饨、肘子、喇嘛肉、烧肉、软米、丸子、粉肠和豆腐。

三烩碗:整鸡、整鱼、整鸭。

另有四碟子馒头、四瓯碗米饭、32个油炸面果、八个莲花大供等食物。

这一行善人头顶烈日,脚踩碎石渣子路,从北谷丰出发途经下申、张名、郃北、新寨等村,直至60里外的麓台山龙王洞祈雨。

麓台山位于祁县城东南60华里外的来远镇石佛窟村山坳,因

其山顶平斜若台而得名。在半山腰的东端有一天然石洞,洞深四丈余,俗称麓台龙洞,内分四大洞,三十六小洞。四大洞是龙王洞、太子洞、润济侯洞、南乡侯洞。龙王洞,洞中有一水池,池上横搭三根粗大的柏木,过木入后洞,有一块钟乳石下垂滴水,相传大旱之年,乡民们就在此祈雨。太子洞,洞内有东汉献帝之子的石像,洞内常年有一股清泉潺潺流淌,好似优雅的琴声,水量可供千人食用。润济侯洞,洞中央有润济侯石像,此洞深不可测。南乡侯洞,洞内有东汉末年南乡侯王陵石像,洞内整日风声如吼,空有流水之声,却不见水,时而有两人对话之声,时而云雾满洞。龙王洞口建有一庙,形成了麓台山特有的人文景观。据《永乐大典》载:“麓台山,一名顶山,在本县东南六十里,宋相张商英修麓台祠于其上。”^①“麓台神庙,在县东南六十里麓台山上,有庙尚存。”^②《祁县县志》(光绪八年本)也有记载:“公元265年,祁衙在麓台洞内供奉龙王,故名‘麓台龙洞’。”洞口之庙是为纪念汉末司徒王允的侄子王陵而建^③。相传王陵任官期间被朝廷追捕,逃到麓台山谷峪沟,见一只白鹿带箭飞跑,就紧紧跟在后边,进入山中,白鹿跑进一个山洞,王陵随之钻入,却不见白鹿的影子,就坐在地上歇息,不一会儿就坐化了。后来朝廷传下圣旨,封他为润济侯,掌管行云布雨之事,当地民众在此立庙祀之^④。当地民众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麓台爷是大韩村的外甥,他自幼父母双亡,靠给别人牧羊为生。他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深受乡邻喜爱。有一年大旱,庄稼颗粒无

① 《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二。转引自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山西古方志辑佚》(内部资料本),第2页。

② 《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二。

③ 王陵,字彦云,三国时魏人,原籍祁县修善村,任太尉期间,忠魏而死,后人在南山麓台龙洞建祠纪念,人称“麓台爷”。

④ 祁县民间故事集成编委会主编《祁县民间故事集成》(内部资料),1990年,第17页。

收,他来到大韩村舅舅家借粮,舅舅虽是大韩村有名的财主,但生性吝啬,不仅不借,还辱骂他:“你王门休要求我韩门,我韩门也不求你王门,如求你王门,叫我韩家死一口人。”并把王凌赶出大门。王凌愤而出走,行至南山时饥渴不支,坐化为一座石像。据说,自此以后当地乡民天旱去石像前求雨,有求必应,人们便盖庙祭祀,尊为“麓台爷”,把南山也改名为“麓台山”。只是凡有大韩村的人来求雨,必然要死一位善人,大韩村人只好在村里修了座龙王庙,内设“麓台殿”,以示悔过,并常年香火不断。尽管大韩村的村民如此烧香供献,衷心祈祷,每次祈雨总不免要死一个人。因此,“大韩村祈雨一定死人”的说法流传至今^①。

北谷丰求雨的十三善人光着脚板,在炎热如火的山路上行走,从来远镇进入峪口,一步磕一头,直上麓台山去,在正午前赶到龙王洞内,跪在龙王像前,祈雨善人将带来的水瓶置于龙王洞钟乳石的滴水处,往瓶内滴一滴水,就意味着天降一寸雨。有一个人点一炷香,这炷香烧完祈雨停止,其中一名称为“记事官”的善人记下祈了几滴水,当众宣布,如祈三滴以上,大伙儿高兴地跳呀、唱呀,锣鼓齐鸣。抬食盒的分别把供品摆在龙王和麓台爷神像前的供桌上,桌上点两支红蜡烛,烧八八六十四把香,吹奏六六三十六段曲,磕七七四十九个头,跪拜时口里念叨着一些天旱成灾,乞求神灵显灵降雨的祷告语,但无统一的样式,把心愿说出来即可。最后许愿,降雨后必定谢神。这样跪了一个时辰,十三善人才站起来收拾供品,到洞内取回水瓶,小心翼翼地双手捧在胸前走出洞外,诸事完毕后,才在山下找个树荫休息^②。

到下午4时,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霎时,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求雨善人们顿时欣喜若狂,跪在雨地里,张开双手接着甘霖,倒入干

^① 讲述人:李翠玲,女,农民,70岁,大韩村人。

^② 据祁县来远镇石佛窟村民白四则(男,72岁)讲述。

裂的嘴唇里,所受的煎熬此刻已化为乌有,心情无比畅快。这一行苦善人认为自己虔诚请罪,终于感动了麓台爷恩施雨泽,于是忙又返回神庙,跪在麓台爷的神像前许愿一番,并给龙王洞内全部神像磕三个头出洞,洞外各殿的神像前点燃三炷香,磕个头,这才转身下山,返回到下申村^①,按惯例住在该村隆盛寺内等待接雨的队伍。

北谷丰村村长和村民,在善人们祈雨走后,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看到老天爷果降大雨,人们马上齐集本村关帝庙内敲钟放炮,供献磕头。村长一面派“报马”到下申村联系接雨事宜,安抚一行苦善人;一面给周边村庄下请帖,通知其按时到下申村接雨。第二天,接到请帖的各村接雨队伍陆续来到下申村,在队伍前有一人高举写有村名的纸制横匾,白纸黑字引人注目。接着是锣鼓队和身穿道袍、肩挑纸做黄色水桶的童子队和手拿拂尘的道童队,依次是细乐吹奏队,后面跟随的是接雨的民众,大约近20个村的队列。各村接雨队伍在下申村外自行集中,由最排场的北谷丰接雨队在前领头,其余各村相随鱼贯进村。各村仪仗队虽不尽相同,但参加接雨的人一律头戴柳圈,光着脚板,且不许女性参加。仪仗队通过下申村大街时,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密密匝匝的观众站满街道两旁^②。

据说,此次接雨,县官也赶来了,轿子到了下申村的南门口停下,然后赤脚走到庙里,表示与民同乐,因为祈雨虽是北谷丰一村发起,而全县民众受益。在接雨仪仗队表演的各种技艺里,让人拍手称绝的有三项:一是丰固村的大钹。在该村的锣鼓队中,一人拍着大钹,到了兴头上突然手一扬,一钹就飞上半空,落下时用手接

^① 据谷村村民陈永禄(男,74岁)解释,求雨的一行善人落脚在下申村等待各村迎接,为什么选择下申村呢?主要原因在于:a.下申村是个集中地,于各村联络方便。b.取其中“下”之意,企盼求雨成功。

^② 参见薛贵芬《农村习俗琐记》,原载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祁县文史资料》(内部资料本),1993年5月第九辑,第168页。

住继续拍而鼓点不乱。二是修善村的大鼓。此大鼓平时在村内大寺内存放,用时因鼓太大寺门里出不来,就由二三十人分两班用绳子把鼓吊起,里边的人在下面推,外面的人在墙上接,方可取出寺庙。此鼓由16人抬着行进,鼓上有二人敲击,鼓大音高,振耳欲聋。三是北谷丰村的万民伞,伞杆高约四公尺,伞盖直径约二公尺,由一青壮汉子用布袋裹着一个石钵套在脖颈上,石钵放置在小腹前,伞杆插在石钵内,以骑马姿势向前行进,两手交替转动伞杆,表演甚为壮观。三项技艺夹杂在各村组成的浩大的仪仗队伍中,表演到精彩处,人们的欢呼声、呼啸声、喝彩声、锣鼓声、吹奏声混杂在一起,鼓乐喧天,声震如雷。在欢乐的气氛中,人们把祈雨的一行善人迎送出村,走上回北谷丰村的大道,各村队伍也各自回村,等着观看北谷丰村许下的谢雨戏哪!

北谷丰十三善人祈得甘霖后,全村一片欢腾,为感谢麓台龙王爷,乡民们摊钱请来戏班子,在村里财神庙戏楼上唱起了大戏,连唱三天,皆为喜庆吉利的剧目,如《满床笏》、《断桥》、《珍珠衫》、《忠报图》,其中太谷县“锦霓园”、祁县“聚梨园”两个戏剧班社演出的剧目被誉为“好戏中的好戏”,备受青睐。演戏前,村长率善人及村民们到观音堂里献供,供品为祭祀麓台爷后抬回来的东西,祭祀完毕,村长把用褐色丝绸剪成的61只蝴蝶^①放在香炉里烧化,以为麓台爷已化为蝴蝶前来享用了供品。然后,谢雨戏开始了,四乡村民扶老携幼,盛况不亚于赶庙会。

二 贾令镇四善人赴狐神庙求雨

贾令镇地处祁县北部,是昌源河、乌马河、潇河等几条河流的冲积平原,地形由东南向西北略呈倾斜,三条河流在这里同时汇入

^① 61只蝴蝶象征距离麓台山61公里。

汾河。天涝时洪水涛涛,这里成为一片泽国;天旱时,有限的河水被上游拦截,下游滴水难见,土地干裂,庄稼焦枯。据贾令镇“前营村村史”^①记载:“光绪元年至三年大旱,寸草不长,颗粒不收,民众苦不堪言。当地流行的歌谣是:‘天遭荒旱整三年,大人小儿死一半,树皮草根全啃光,人吃人来犬吃犬。’”这就是当时旱情的真实写照。光绪二十六年又是大旱,加上清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可谓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直到农历五月二十七日才下了一场大雨,人们抢种了一些庄稼,当时有“蛤蟆耕地鬼锄田”的说法,意思是牲口饿得骨瘦如柴,打一鞭子便拱起腰,四条腿向前跳动一下,像蛤蟆一样;锄田的农民面黄肌瘦,黑水满脸不成人样,故称“鬼锄田”。78岁的村民郝晋光说,光绪前该村是祁县八小镇之一,居民两千余人,而连年遭灾后,人口骤减,房倒屋塌,成为一片烂摊子。直到1949年仅有人口975人。

由于天气大旱,颗粒未收,繁重的苛税不能幸免,无奈,这些朴实憨厚的庄稼人只好乞求上天恩赐,普降甘霖,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据82岁高龄的段亮老人(1918年出生)讲述,在他六七岁时,曾亲眼见到贾令村组织的祈雨队到附近交城县狐爷山祈雨。

在贾令村西南方向(现在贾令高中所在地)有一座狐神庙,相传是为纪念春秋时晋大夫狐突父子而建(狐突之子狐偃,字子犯,因是晋文公之舅,故称舅犯,是助晋文公成就霸业之人)。再加上贾令一带的人经常看到乌云从交城那边滚来便能下一场透雨,以致把两处联系起来当作一家,每逢大旱,便由贾令村村长与邻近村庄联络,达成到交城狐爷山祈雨的协议。

祈雨之前,要请七位善人在本村狐神庙内烧香祭拜,这七位善人都是自愿参加,且平日就吃斋念佛,品行端正。祭拜的方式是七天一轮,在祭拜期间,七位善人不得出庙门,庙内香火不可间断。

^① 参见“祁县地方志丛书”《贾令镇志》(内部资料),1997年。

他们在庙内只能吃豆角、地瓜等素菜,不得食荤。若拜七天不下,就接着再拜七天,一直拜七七四十九天,若还不下雨,这才派人到交城狐爷山祈雨。通常情况下,在49天内老天不可能滴雨不下,因此当地求雨只是在本村庙内祭拜,而不外出祈雨(据段亮老人介绍他仅见过一次贾令村人赴交城狐爷山祈雨)。

到交城狐爷山求雨的当天,村里张贴布告,严禁屠杀,不准抽烟,忌说“旱”、“干”二字,例如“豆腐干”要说成“豆腐疙瘩”,各家门前都要设香案,放上插有柳枝的水坛或水瓶,供奉龙王雨师。

这次自愿求雨的有四位善人,他们在贾令村狐神庙祭祷后,相偕向交城狐爷山出发。四位善人的分工是:一个打着“祈雨求泽”的小旗领队前行;另一个在肩膀上刺入筷子粗的银钩,因为一连49天的祭拜都未能感动上天,可见罪孽深重,所以要承受难以忍受的苦难向神明表示自己的改过之心,赐给雨水;还有一个胸前吊着水瓶,俗称“紫金瓶”,准备盛放求来的水;最后一个是沿途照料受难之人。一行四人头戴柳帽,赤脚跋涉,不断高喊“南无佛”(“南无”为梵语“敬礼”之意)、“阿弥陀佛”(梵语意为“无量寿佛”,是大乘佛教信奉的一个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沿途及狐爷山下都有寺庙住持照应。从祁县贾令到交城狐爷山相距约一百里,第二日即可到达。

狐爷山,位于交城县西南方向,距该县的古洞道乡约有六公里,原名马鞍山,因为晋文公外祖父晋大夫狐突并二子狐毛、狐偃葬于此地而得名。世人尊崇狐突,于该山建庙立祠,常年祭祀,两汉以后历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贞报国的正义行为为楷模。及至宋代,狐突声望日隆,宋徽宗封他为忠惠利应侯,邑人也四季祭祀,逢旱祷雨。清光绪三年大旱,为祈雨求神,光绪皇帝下旨敕加“灵弼”二字,于是狐神庙山门悬九龙螭珠竖匾“灵弼忠惠利应侯庙”,并在每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唱大戏、抬铁棍(当地的社火节目),隆重祭祀。贾令村四位善人到达狐爷山后,将带去的水瓶放在山洞内滴

水的隙缝上,跪拜三昼夜,然后抱着滴有泉水的水瓶往回走。

贾令村民在四善人走后的第七天,便组成接雨队前去迎接,在文水县西社渡过汾河迎上祈雨归来的善人,相偕而归。

在接雨的前一天下午(即四善人赴狐爷山祈雨的第六天),所有参加接雨的邻近各村信众都集合在贾令,为第二天的接雨进行编队行进练习,俗称“踩街”。其组织办法是,凡有男丁的农户,除老弱病残外,必须有一名男丁参加。对参加踩街的民众按年龄大小,分为三种类型的编队。

祈祷队,走在队伍最前面,由20岁以上的青壮年组成,持香呼佛祷告(所呼口号与祈雨者相同)。

担水队,排在队伍中间,由15岁以上者化装为戏中的仙童、道童,他们身着彩色衣裙,肩挑精致的水桶,边走边舞。

磕头队,跟在队伍最后,由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组成,他们手拿裹有棉垫的小凳(也有人备有专门用于磕头的凳子),排队前进,有一成年人持长竿在队伍前引导,每走十几步,便用长竿在地上画一下,持凳儿童在原地转一圈后,在小凳上磕一个头,再继续前进。

此外,各村都有自己的音乐队,随从的人员一律头戴柳帽,赤巴脚,高声喊佛。排列在队伍最后的贾令狐神仪仗队最为特殊,他们抬有三乘轿子,一乘内专放神的印盒令箭,一乘内放着神的木制牌位,还有一乘空着,准备安放从狐爷山请来的小神像(也有人说由三个身着道袍、骑着高头大马的人,分别背着令箭、大印和牌位,行走在队伍中间,有神仙派遣之意)。在轿子后面跟着一只羊,最后是持有各色彩旗的队伍。在下午的踩街演习中,各村的队伍鱼贯而行,布满了长长的街头,街道两边观看的人们摩肩接踵,热闹异常。次日,各村在早饭后整队出发,正午,到达文水县西社村,渡过汾河迎接祈雨归来的善人。祈雨者从狐爷山带回一尊小神像,与接雨队相遇之后,便把小神像放在那乘空轿内,一起返回贾令。按当地的讲究,要尽量赶在日落前返回。归来时,如恰逢天降大

雨,各家门前的水坛和从狐爷山抱回的水瓶一起倾泻,顷刻之间,满街汪洋,万众欢呼,以为神真灵验。于是,将接雨队带着的那只羊杀掉来祭神,同时供奉猪头三牲,并唱谢雨戏。

如果在祈雨期间或祈雨归来后,仍一直不下雨,四位善人就要在请来的小神像前继续拜祷七天,直到最后一天还未下雨,才宣告祈雨结束。若在七天之内下了雨,则同样也要唱谢雨戏。

谢雨戏一般唱三天,第一天称“起场”,第二天称“正场”,第三天是“末场”。与上述北谷丰村求雨演戏不同的是,演戏之前,管事人用褐色丝绸剪成蝴蝶黏在小神像头部,象征着狐神已化为蝴蝶前来,以此加重求雨仪式的神秘色彩。演出时,不可更易的规矩是,由神来确定演出剧目,方法是把写有戏名的签子放在一竹筒内,由主持人摇晃竹筒,哪个签子掉出来,就唱那个签子上写定的戏。相传一次唱戏前抽签定戏,神签上的戏名为《八义图》,但人们认为这出戏没有水,因此就改名为《乾坤带》,结果当天晚上轰隆隆地打了一晚上雷,却未下一滴雨。于是当地便流传下了这样的谣谚:“《八义图》换成《乾坤带》,干听打雷雨不来。”也许这是偶然的巧合,然而人们却信以为真,更觉得神命不可违。

三 南团柏村的抬龙王求雨

祁县东观镇距县城 12 公里,位于县城东南方向,与太谷县交界,这一带乡村流行“抬龙王”的习俗。据 74 岁的张锦光老人回忆,东观镇南团柏村最后一次也是最盛大的一次求雨活动是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那时大旱已持续两年,庄稼颗粒无收,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本村不少人离乡背井走西口,即到包头谋生。于是被村民称为“张善人”的该村地主张锦年,一方面开仓救济灾民,一方面又发起求雨。农历初六上午 9 时许,社(村内按家族划分的民众聚合组织)中长老张锦年在“神头”(即社首)的陪同下,来到村

西头的龙王庙,早已等在庙外的12岁以上的社中男子(皆为张姓)百十号人,准备听候长老的差遣。

龙王庙里供奉着四位龙王,分别是黑、白、黄、红四种颜色。其中黑龙王为泥塑,位居庙内正殿的中央,另三位龙王则为画像,绘于黑龙王像后面的墙壁上。黑龙王通体墨黑,头梳单辮,斜挽于脑顶左侧,脑顶右侧为一短角,身着黑色龙袍,正襟端坐于形如太师椅的神座上。那一双黑白分明、大如砖块、双睛暴突的眼眶,煞是吓人。

张锦年长老来到庙里,先跪在龙王塑像前献上三炷香,由神头把两支粗二寸、高五寸的大红蜡烛点在供桌两边,再把祭品放在供桌上的碟子内。祭品有面蒸:面佛手、面石榴、面寿桃、面莲花各四个;油炸的九丝十八弯、细如粉丝的麻花及麻黏水脱(即上面黏有芝麻的面饼)等。摆放好祭品后,长老向龙王行三拜九叩大礼,同时,院子里也跪满了黑压压的人,礼毕,长老把写在黄纸上的祭文焚烧在火盆里。祭文曰:

伏惟

大慈大悲神威无比惩恶扬善有求必应乌马河龙王,亢旱二载,生灵涂炭,惶乞普降甘霖,以润万物,以泽生灵,救万民于水火,拯百姓于一旦,诚惶诚恐敬拜。

尚飨

壬戌年闰六月

祭祀完毕,由神头从人群中叫出事先选定的四个壮实后生,着一色崭新的青色裤褂,头戴柳条圈,脚穿黑色鞋,肩搭白羊肚手巾,前额系着“有求必应”的红缎带,每人拿一根碗口粗的、外表用红布包裹的“明杆”(粗木棍),神头站在殿门左侧,吆喝一声“请龙王”,四个后生应声扛着明杆走进龙王殿,把明杆成“口”字形交叉穿过龙王神座,用红绸带缚紧,这时神头又大声叫着:“起驾!”于是便抬着龙王塑像缓缓出殿。抬到庙外面的戏场里,等待着黑龙王的娘

娘“彩彩”到来,然后与彩彩一起回娘家——距南团柏二里地的王乔堡村。

南团柏村西北二里地外,有条河叫乌马河,河北岸有个王乔堡村,村头的河岸上建庙一座,俗称“彩彩庙”。相传彩彩为王乔堡人,她端庄美丽,与南团柏村叫张龙的后生私定终身,但遭家人反对,绝食而死,张龙遂自投乌马河殉情。后来玉帝念张龙、彩彩情深意笃,封之为乌马河龙王和女河神。当地农民天旱求雨甚为灵验,于是在岸边建彩彩庙一座予以祭奠。庙中彩彩的塑像凤冠霞帔,面容秀丽。据说六月初六是她的生日,而六月十二为黑龙王的生日。因此,当地村民求雨便从六月初六开始,直到六月十二,延续整整七天。

接彩彩的花轿一大早就从南团柏出发,花轿后跟着细乐队,由八人组成,吹着笙、箫、唢呐等乐器,打着小鼓。花轿由四位身着青衣、青裤、黑口鞋,头戴柳圈帽的轿夫抬着,花轿的顶部塑一凤头,四角分别挂一个红布绣球,轿篷绣着龙凤呈祥的花纹,一路吹吹打打去迎彩彩。

迎回彩彩后,便和黑龙王一起抬着游街。彩彩的花轿走在最前,接着是由四位后生用明杆抬着龙王,明杆后跟着16名身穿斩衰^①孝服,手拿哭丧棒的孝子,全部由村民自愿充当;再后是36人组成的乐队,锣鼓喧天,喇叭、唢呐“哪儿哇、哪儿哇”的吹着;最后是社里头戴柳圈帽的12岁以上的男子,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纸扎,有的提着一公尺多高的金山、银山,有的举着两公尺高的金光闪闪的镬幡,还有纸糊的戏台、暖阁,五光十色,耀人眼目。

游完街后,将黑龙王和彩彩一起抬到王乔堡,俗称“回娘家”,把二位神同时供奉在彩彩庙里,由王乔堡的社首领着本村信众祭

^① 这种孝服用粗麻做成,不缉边,断处外露。在民间是子女为父母守孝之服,是守孝最重的服饰。

祀一番后,当天再将黑龙王抬回南团柏,而彩彩留住娘家一个晚上,第二天再接到南团柏。如此反复举行这种仪式,直至七天后的六月十二日,祈雨才告结束。

在这种抬龙王的祈雨仪式里,姑娘、媳妇们不但不准参加,甚至连看热闹的份儿也没有,当地人认为这会使求雨不灵验,有渎神灵。

据说这次求雨到了六月十二日这一天后晌(下午),果然降了半个时辰的暴雨,立时街满沟平,百姓欢呼。现在该村每年六月十二日还有赶会的习俗。

四 其他求雨方式

1. 晒土地求雨

祁县东观镇和贾令镇的许多村庄,旧时有“晒土地”求雨的习俗。作为社主的土地爷,掌管一社之事,本该和天官雨师搞好关系,把本地旱情禀告上去,让其普降甘霖,以拯救黎民,可是土地爷在干旱时却怠忽职守,不为这一方百姓作主。于是便有七个村童相约从别人家偷出土地爷(丢失土地爷的人家是不予追查的)^①,集中在一家院内,面朝南蹲在烈日下曝晒,使其亲尝烈日煎烤的滋味,吃点苦头,逼其上天报告天官降雨。据贾令镇 73 岁的高庆文老人介绍,在民国三十一年,他曾与其他六位孩童相约,偷出土地爷集中在村东袁培蕊家进行曝晒,结果一直晒了七天仍滴水未降,只好再将这些土地爷送还各家。在东观镇一带如偷土地爷之后七天内下了雨,村童便向大人们要上一碟子扒了皮的鸡蛋、一块豆

^① 旧时晋中农村,家家都有土地爷,一般在正对院门的影壁上设有神龛供奉,土地爷为陶制像。

腐、一把老葱供奉土地^①,烧香叩头,以谢神灵。

这种求雨方式,已不是对神灵的讨好与乞求,而是对其进行揶揄与嘲弄,是一种天真大胆的惩罚。

2. 寡妇洗罗汉求雨

距县城六里地的谷村,旧时有“九寡妇洗罗汉”求雨的习俗。据本村84岁的陈三女老人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久旱无雨,谷村申姓族长召开家族议事会,讨论求雨事宜,决定挑选本村贞节老寡妇到本村隆兴寺洗十八罗汉,因“汉”与“旱”谐音,洗罗汉意即洗“旱”。

这一天,本族(申姓)选出九个老寡妇洗净手脸,穿着素洁衣服,手端铁制洗脸盆,盆里放着白色的新布手巾,她们相继入寺,跪在十八罗汉像前,烧香磕头。口中不断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边念边跪在神座上拿布手巾洗“旱”,从罗汉的头到脚揩拭尘土,祷告下雨救民。祷告时念的顺口溜是:

洗的老^②,洗得旱爷爷^③哭了;

洗身子,洗得旱爷爷跑了;

洗两足,洗得旱爷爷再也来不了。

并许愿在七天内降雨后,全村上供,演唱三天猴儿戏(即皮影戏)酬谢神灵。但这次祈雨并未巧遇甘霖,故也未酬神。调查中,我们询问其中的原因,一位老太太挺神秘地说,那是因为在九名求雨的寡妇中有一个不贞节,私养汉子,结果欺骗了神灵,犯了禁忌,使神灵发怒而不降雨。

贾令村民段亮老人回忆说,民国十三年(1924),天气大旱,本村选出18名贞节寡妇到村内二郎庙去洗十八罗汉,洗的方法一如

① 采访中,祁县的老人们说,土地老儿不吃“大供献”,即不用馒头之类的面制供品。

② 的老,祁县方言,即“脑袋”。

③ 旱爷爷,即民间传说中的旱魃。

上文,并许愿降雨后全村唱戏三天。结果在洗罗汉后的第三天,果降大雨,为此在二郎庙唱了三天皮影戏。

五 结语

从以上祁县求雨习俗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旧时山西晋中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农村求雨的状况,通过对这些个案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晋中求雨习俗中三教互融、多神信仰、兼容并蓄现象尤为突出。在晋中地区的祁县、太谷等地,求雨的信众既供奉龙王,同时又崇祀关公或观音菩萨。在祁县北谷丰的接雨仪式中,大伙口念“阿弥陀佛”,可是队伍中又增加了不少打扮成道童的儿童。求雨中形成的惯俗是,只能男子参加,妇女则禁止加入,甚至连看看热闹都不行,这显然是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所致。据老者回忆,1949年以前祁县北门外,曾有一座三教阁,里面供奉着孔子、吕洞宾、释迦牟尼像,阁顶悬有傅山先生书写的匾额:“谁知水乳交融。”可谓道出了三晋传统文化的特质,这种三教互融的文化特征也必然在求雨习俗中体现出来。

三教互融的前提是三教互通,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导文化;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本土宗教,同时又凝结、融合了诸多文化因素;佛教虽是外来文化,但在漫长的播布过程中,经过本土文化的同化,使之成为中国化的佛教。儒家注重现实,佛教追求的是彼岸的世界,道教则迎合世俗人欲,观照的是现实生存的利益。然而三者任何一家都不能解决民众生存的现实问题,无法满足其心理需要,因此三教互通导致了三教融合,这也是社会历史的必然要求。从山西地域环境来看,它位于黄河中游的中原文化区,其经济、社会文化长期属于领先地位,对其他地域遂产生一种凝聚力或向心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着文化冲突与交汇。

在民俗信仰中,各种与民众生存命运相关的神祇被接纳过来,从而形成了该地区多神崇拜、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晋中的求雨习俗也不例外。

其次,晋中求雨习俗中的龙王,大多是历代民众在长久的文化传承中,由历史人物、传说人物擢升起来的地方神祇。如狐神庙供奉的是春秋时晋大夫狐突,南团柏村抬的龙王原型是朴实憨厚的农村青年张龙,这些出自本地区的实有的历史人物、英雄祖先或普通的某位群体成员,大多有为民造福、舍己奉献的人格精神与历史功绩,从而得到该地区民众的景仰,因景仰而立祠成神,进而予以崇祀,寄寓着求其庇护帮助的良好愿望。而在民众看来,外来的神也好,官方赐封的神也罢,“远水不解近渴”,都没有本地的神现实可靠,这大抵正是民众造神的共同规律。

民众祭祀的龙王具有升天入水、变化不居的神性和司水理水、兴云布雨的神职功能。总之,龙王和雨水有着密切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众祈雨的主要对象,因为雨水乃是农耕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自然条件之一。至于祭祀关公,崇信土地爷,实际上是一种全神崇拜,他们都是全神形象,其神职是无所不能的。但在诸多神职中,主雨的职能必不可少,因为尽管民众的祈愿是多种类、多层面的,如求子、求财、求安全、求健康,而对于农耕地区的民众来说,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满足生存的第一需要尤为重要。因此在民众崇信的神祇中,许多神都有主雨的神职,或者说同一个神具有的多种神职中,降雨也是其最重要的神职功能。

另外,求雨是山西历史上特殊的文化现象,它反映了民众社会心理的嬗变。晋中祁县的祈雨大体包括祭品、献祭方式、祭祀程序等方面的内容。祭祀神灵的祭品不外乎牲祭和物祭,而物祭是最普遍的。祭祀仪式中的献祭方式最典型的是“暴”和“乐”。所谓“暴”,指在久旱不雨的情况下,心急如焚的民众,对龙王一改敬拜为惩罚,将神像或神的代言人置于烈日下曝晒,使之亲受煎熬,通

过这种巫术手段达到致雨的目的。所谓“乐”，指用奏乐、舞蹈及各种社火节目来祭神娱神。从祁县北谷丰和南团柏的求雨仪式中可明显看到这种现象，这是人们将己比神，以为最能引起人们振奋的游艺节目，也必能使神灵愉悦，而舞蹈本身又是模拟神灵降雨的仪式，人们通过这些活动进而实现自己的愿望。祭祀的程序经过历代传承也已模式化，一般是先祈雨，再接雨，最后唱戏酬神——谢雨。

求雨成为山西文化发展史上一道特殊的景观，这应该从山西人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去寻找根源，在旱象笼罩之下，水对于农耕地区的民众来说是生命之源，求雨是生命攸关的大事，旱象构成了山西人特殊的生存环境，求雨是无奈的抗争方式，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凝定了山西人靠天吃饭、崇信龙王的生存观念。这种传统信仰发展到当代有了新的变化。总的说来，在风调雨顺的年景或水利条件较好的地方，求雨活动少些，而在旱年或自然条件差的地方则仍流行此俗；从求雨者年龄结构来看，老年人持虔诚信奉的心态多些，中年人则持“宁信其有，勿信其无”、“参与比不参与保险些”的随俗态度，年轻人则态度冷淡，甚至只是出于好奇，为看新鲜而参与求雨。笔者于1997年6月4日到太谷县北洸村观看了在该村龙王庙举行的求雨活动，龙王殿仅有一间房子大，东面是真武殿，西面是观音堂，龙王像^①供在庙里十层砖台砌的神位上，像后面墙上挂着“有求必应、心诚则灵”的绸幅，求雨的是年逾六旬的二十多个老汉。尽管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求雨作为一种经验代代相传，它曾经使贫苦的民众在神灵的怀抱中，心灵得到抚慰与补偿，但它毕竟是生产力落后的产物，随着社会的进步，固有的信仰心理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必然会发生变化，经历着从笃信→半信半疑→否定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必然。

^① 该龙王庙正在维修，故用红布条蒙着龙王双眼，身上披挂着红布，等待开光时揭开。